

当代中国热点 问题透视

谢京师 王桂兰 主编
汕头大学出版社

前 言

在人类即将跨入公元 21 世纪的非凡岁月，社会历史发生了空前的巨变。综观当今风云变幻的世界：东欧剧变，解体后的苏联动荡不宁；美国想称霸世界，但又力不从心；西欧实力增强；德国、日本崛起；中国稳步发展……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是，世界并不平静。当前和未来的世界，都会既有芬芳的郁金香，又有熏人的火药味；既有亲密的拥抱，又有激烈的冲突。在当前世界重新分化组合的动荡之际，中美关系如何发展？中日关系前途如何？香港、台湾能否顺利回归祖国？21 世纪在亚太地区谁主沉浮？等等，这些重大问题正在成为中外有识之士热心研究的课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神州大地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改革开放十几年来，中国人民经历了多种磨练：一次次政治风波、自然灾害连年不绝，这一切的一切，使中国人民更现代、更现实、更理性、更加从容不迫，更能经得起改革开放的风吹浪打。

我们的改革是空前的伟业，因为它不是单方面改革的独奏，而是经济、技术、政治、文化、观念、意识等全面大变革的一部交响乐。因此，我们的改革虽然没有“暴力”和“流血”，但是，改革的每一步成功的背后都包含着无数的困难、矛盾、牺牲和代价。所以，在改革

大潮奔腾前进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矛盾,例如人口“爆炸”的威胁;生态失衡的报复;农村潮的喜与忧;国有企业的出路;股票、证券潮的兴起;通货膨胀的游动;新富豪的欢与悲;全民经商的是与非;经济开发区热的功与过等等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必须有正确的认识。

我们编著《当代中国热点问题透视》一书的目的,正是想运用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与世界发展中及我们在改革前进中出现的许多热点问题给予评说,我们的评说是否正确,殷切期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谢京师

1995年4月

目 录

前 言

第一编 中国与世界

- 一、中美两国的冲突与合作 (2)
- 二、日本经济的腾飞、发展与中国的未来 (8)
- 三、中越之间的磨难与深情 (23)
- 四、中国与以色列的新里程 (35)
- 五、台湾问题牵人心 (47)
- 六、香港回归祖国势不可挡 (63)
- 七、西藏永远是中国大家庭的成员 (79)
- 八、21 世纪谁是雄视太平洋的主角 (89)

第二编 中国的困惑与生机

- 一、市场经济冲决旧体制的围城 (103)
- 二、人口“爆炸”的威胁 (117)
- 三、严重的能源短缺与浪费 (130)
- 四、生态失衡的报复 (137)
- 五、我国交通的现状与出路 (156)
- 六、国有企业向何处去 (166)
- 七、乡镇企业的阵痛与新生 (175)
- 八、“农村潮”喜忧参半 (189)

九、“下海”面面观	(200)
十、公债沉思录	(211)
十一、股票、证券潮	(224)
十二、惊人的吃喝“疯”	(232)
十三、中国新富豪的欢与悲	(241)
十四、经济开发区热的功与过	(253)
十五、全民经商的是与非	(261)
十六、通货膨胀的幽灵在游动	(268)
十七、文盲大国忧患录	(280)
十八、高校面临大冲击	(290)
十九、就业与待业的困境	(297)
二十、假冒伪劣商品大写真	(309)
二十一、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领导反腐肃贪	(317)

第一编 中国与世界

一、中美两国的冲突与合作

中美两国关系，在其发展历史上也经历了几次大的“变革”，这种“变革”其变化之大，在世界局势中的影响之大，甚至在有些时候超过了中国本身的变化。纵观中美两国交往史，依据不同时期双方之间的关系变化可分为：初建贸易关系时期、美国对中国商业扩张时期、美国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渗透时期、中美两国关系恶化时期、中美两国关系的崭新时期。这里，我们简要回顾中美两国的交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透过两国交往中的冲突和合作展望未来的发展。

本世纪四十年代末，是中美两国关系的恶化的开始。当然，造成这种局面是由于美国对中国所采取的封锁、孤立、遏制政策的结果。七十年代初期，当时的中国国内正处在一种社会动荡时期，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主要来自原苏联）也比较紧张。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国逐步调整政策，转而把中国视为共同对抗前苏联的“盟友”，揭开中美两国关系新时期的序幕。到八十年代末期，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达到“鼎盛”时期。但是，纵然如此，两国间也不断发生“冲突”，主要是台湾问题，这是摆在两国间的实质问题。这一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则中美两国关系根本性的改变是不可能的，只会重新沿“合作—冲突—合作……”这样的轨迹前进，即两国在经济上的合作多于政治上的合作，而一旦双方政治上的冲突扩大，也就势必影响两国在经济上的合作。而历史的发展已证实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多侧重本国经济利益的考虑，正如1988年美国驻中国大使温斯顿·洛德先生在中美建交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所讲的那样，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正在从长征老战士手中接过领导权，美国在

一个相互依存、开放的多极世界中感到很自在，中国则正在大胆地进行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是美国的“有利可图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到八十年代后期，随着东欧巨变及苏联解体，美国则对中国进行了重新定位和认识，向台湾出售武器、干涉中国内政，两国间出现了新的冲突。

当然，中国同美国间出现的冲突和合作，都是建立在彼此间国家利益、本民族利益的基础上的，只有符合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才能得到本国人民的广泛拥护，也才能够持久。正因为如此，中美两国间不仅仅是存在着合作的前景也存在着冲突的现实。下面从政治、经济两方面来分析，着重从政治领域来分析两国的冲突和合作。

一、政治领域方面

政治领域涉及范围很广，本文仅取其外交及战略军事两方面浅谈一些看法。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出发点是维护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其外交行为往往受领导人思想意识的支配，而这些不仅仅是在对外部环境长期作出反应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本国、本民族的政治文化、观点、意识形态的反应。纵观美国史，可以说一百多年来，美国国内政治基本稳定，这也就保证了其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但是，美国是一个多民族构成、多权分立、政治多元化的联邦制国家，其国内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和政治机构参与对外交往活动，因而一项具体政策的产生，往往是各集团利益及思想交锋的结果。

回顾中美交往史，可以看出，最早参与两国交往的美国人主要是商人和传教士。早在1784年2月22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驶离纽约，并于当年8月28日抵达广州，于次年5月返回美国，其船所载中国货受到欢迎，在美国历史上出现了对华贸易热。众所周知，商人追求的是物质利益，而传教士则是美国精神生活的代表，

二者在对华的交往中，传教士对政府的政策及国内舆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商人的影响，这一点从清朝统治时期的状况得以直接的证实，传教士在中国胡作非为，导致与人民的矛盾激化，一度直接影响与清政府的关系。美国历史学家汉德为此撰文指出：“无论这些利益集团（指实业家、政治家和传教士）的根本目标如何不同，他们都有一种共同信仰，就是使中国保持门户开放，以便美国人可以扩展他们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和影响。”意即在当时的情况下，“冲突”主要是中国民众同美传教士的冲突，而“合作”是清政府和美国政府为了各自的利益的合作。

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无暇东顾，而日本乘机扩张其在中国的势力。尤其是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出意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这对美国在华的利益是个很大打击。而美国政府深知它自身无法抗击日本的进攻，于是放弃了“诺克斯计划”而同日本合作。此时美国宁可放弃其在华的利益而不愿同日本较量，这就是其外交政策的现实利益主义压倒了道义的原则。当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立刻明朗起来，采取同当时中国政府合作的态度，援华抗日。次年2月7日，两国签订《中美伍亿美元借款协定》，并委派史迪威将军出任蒋的参谋长。这正是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同华合作，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言，意在利用中国战场牵制日军的军事力量，也只是期望战后中国能成为其同盟国而已。当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中的反共意识形态的理想主义在起作用，大量的军用物资投入到反共战场上，而当其如意算盘未能实现时，这种慷慨的援助就再也没有了。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冷落宋美龄访美时对霍普金斯讲到：美国的援助大部分都落进了她丈夫（指蒋介石）和那班腐败的官僚的口袋里，那是一个无底洞，永远填不满的。我们给的够多了，现在该是他们行动的时候了。美国在亚洲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找错了对象。蒋政府既无能又独裁，而且腐败，他只有一点是

我们需要的，那就是反对共产党。杜鲁门的一席话不仅深刻评价了蒋介石的独裁政府而且深刻地讲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理想主义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也就是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冲突”与“合作”的症结所在。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国间的关系是“冲突”占据决定性的地位，因此，中美两国间关系进入了最恶化的时期，美国国内，民主党势力增强、自由主义复兴，要求变革政治经济关系，此时，美国对华政策多侧重于地缘政治而非意识形态领域；而中国国内，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在艰难地前进，取得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成功，对美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美国惊呼“中国的威胁主要是军事上而非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可见，正是基于决策者过多地强调了战略利益，认为在东亚有一个强大的“赤色”中国的存在，对美国便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正因为这样，才有了中国同美国在朝鲜和南越的冲突。

历史的前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到尼克松——基辛格时代，中美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这是现实主义原则统帅美国外交的结果，美军从越南撤军就是其推行现实主义外交的标志，也是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前提。在这种背景下，1979年实现中美恢复邦交，自此中美两国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合作，1980年1月，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在京召开，同时美国国会批准《中美贸易协定》，两国签定一批协议。但应当指出：美国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因为美国彻底改变了其对华政策。相反，美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因而，两国在友好的合作中也不时发生令双方不愉快的冲突。美国国内不时有人妄想利用“台湾”问题作文章，使中美两国关系曾几次出现倒退。1980年，当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发表竞选演说时，就宣称：若能当选将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1981年底美国就准备向台湾出售武器零配件并经里根批准援外法的一项修正案，并于1982年4月12日，正式向台湾出售6000万美元的军火配

件。在这一段时间内，中美两国之间有冲突也有合作，但总体上看来，合作的倾向大于冲突的意向。直至1989年，中国国内那场政治风波后，中美两国间的关系出现了历史的倒退，在一些领域里发生了冲突，使双方都蒙受了较大的损失，这主要是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尖锐化、公开化，最终导致在其它领域的冲突。美国为了自己的本国利益，又向台湾出售武器，并公然置国际舆论与国际原则于不顾，反对中国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悍然制造“银河”号事件等等。

总之，回顾美中交往的历史，无论在任何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中始终贯彻着理想主义与现实利益主义。

二、经济领域方面

据有关资料记载，自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至1989十年间，双边贸易翻了两番，贸易额从1979年21亿美元上升到1988年的8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是16.8%，美国企业及公司在华直接投资达31.4亿美元，并一举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可见中美两国间在贸易领域内的“合作”，是迅速而发展良好，这其间的关键仍在于对双方都有益处。从美国方面考虑，中国地域广阔、人口多，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而占领这一市场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起着重大作用。因而，从此角度看双方在贸易领域里的合作对美有“百益”。那么，从中国方面考虑，相对中国而言，美国社会高度发展，积累了关于机器化大工业、现代生产的管理经验和知识，而这些都是人类现代文明和智慧的结晶，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必不可少的。通过中美贸易，中国可以从美国社会学到先进的管理知识，启蒙中国的现代企业管理，缩短同世界发达国家间的距离；另一方面，通过中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可以对中国产品的内在质量及性能特点各方面作一次检验，取得感性认识，以提高我国民族工业、企业的素质，推动民族工业、企业发展，提高其产品的竞争力，利用在美国市场中取得的经验去开拓新局面。1988年6

月，深圳赛格集团作为股东之一的大公司，一举买下了美国东部的95家零售销售网，花去上亿美元。此消息犹如一声爆炸，震动世界舆论界。赛格公司不惜巨资在美国市场门边安放下一枚棋子，其目的十分明显，通过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直销，取得经验，同时利用这些销售网络的耳目作用，为赛格产品大举进军美国市场，与索尼、松下公司逐鹿美国打下坚实的基础。正是由于中美双方的合作的巨大利益，才使两国经济贸易往来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

当然，与两国间政治关系相一致，这种经济上的愉快合作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美国对此并未“诚心”同中国合作到底，这其间存在着多种制约因素。首先，从投资额中看，“亚洲四小龙”（即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对美国的贸易占比例是10%，而中国仅为1%，美国对亚太的直接投资额占其对外投资的12%，而对华投资额仅占1%，对科技投资更连印度也赶不上。其次，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如至今仍对关于无偿对华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对华输出及技术转让、对中国输美产品的限额配制等等进行限制，附加所谓人权问题，以期达到干涉中国内政的目的。第三，当前的美国对华贸易关注的焦点问题从初期中国经济能否发展转向对中国大陆及“大中国圈”^①意味着什么？美国的一些研究会、文件、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向国际贸易规范靠拢，其经济正与东亚经济“一体化”，中国的经济由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他们认为，此时的中国市场是美国创造就业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他们对此表示乐观，但是，他们又心有余悸，担心美中贸易赤字不能消失，担心一旦中国经济腾飞，综合国力上升，会成为一个像日本那样的竞争对手（有一种说法，日本正在收买整个美利坚，为此美日贸易战不断）。

总而言之，不论今后中美两国怎样发展，美国将始终不会放弃其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对中国的具体政策只能是有目的的投放，以所谓“无形的手”在中国推行其社会制度及价值观，而中国政府则

会以务实的政策,抓住机遇求发展,即两国间无论冲突也罢合作也好,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各自国家利益基础上,正如中国古人言:“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换言之,中美两国间的“冲突”、“合作”取决于中国的美国观和美国的美国观。

注释:

① 国外一些人士单就经济学角度,把中国、香港、台湾合称为“大中国圈”。

(张爱民)

二、日本经济的腾飞、发展与中国的未来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人民有 2000 多年友好往来的历史,也有过一段不幸的遭遇。如果从 1874 年 4 月西乡从道率军武装侵犯我国台湾算起,这段不幸的遭遇有 70 多年。在这一漫长的岁月中,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台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后的全面侵华战争中,使中国人民蒙受了重大的灾难。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执行敌视和遏制中国的政策,致使中日关系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直到 1972 年中日双方才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从 1874 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国台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连年的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可以说,两国人民从历史中得到了“和则俱荣,斗则皆伤”的深刻教训。从内心深处发出了“两国永不再战”的呼声。人民求和平,盼繁荣,渴望能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幸福生活。所以,二战结束不久,两国人民在各国政府的领导下开始建设自己的家园。

战后,日本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很快由一个衰败帝国腾飞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目前,在许多方面已超过了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而居世界之首,而且正在向政治大国迈进。也是由于历史的和其它方面的原因,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比较慢,走了不少弯路,使中国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目前,中国政府和人民已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已制定出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正在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争取以最快地速度赶上和超过世界发达国家,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而且要借鉴其它先进国家成功的经验以及研究一下其它国家对发展的影响。所以,探讨日本经济腾飞的原因、措施以及它向政治大国迈进将对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等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

日本是一个地域狭小、人口密集的群岛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由于战争,日本死亡人数达 222 万,国民财富丧失了 42%,1946 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战前的 60%,工业生产只有 1941 年的 14.3%,海外贸易几乎完全断绝,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价飞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举国一致,奋发图强,在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的共同努力以及美国的大力扶植和帮助下,仅用了 24 年时间,就扭转了全面崩溃的国民经济,实现了工业现代化,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号“经济大国”。

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和起飞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1955 年)是在美国的扶植下恢复经济的时期。战后初期,美国在日本实行了解散财阀和土地改革等经济措施,消灭了封建寄生土地制,扫除了妨碍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势力。同时,美国以“占领地区救济基金”和“占领区经济复员基金”的名义,向日本提供了 23 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以及大量原料、

能源。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获得了24.7亿美元的“特需”定货。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1951年前后，实施了《全国钢铁第一次合理化计划》、《煤炭合理化三年计划》、《电源开发五年计划》等等，扩大了生产规模，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到1955年，日本的各项经济指标(对外贸易除外)都超出了战前的最高水平。其中国民收入为战前的139%，人均收入为战前的107%，全年生产值为战前的187.9%，劳动生产率为战前的131.4%，国民总投资为战前的154.2%，制造业生产为战前的189.4%，农业生产为战前的133.7%。

第二阶段(1955—1973年)是高速度增长时期。日本依靠对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大量设备投资，固定资本更新和技术革新，使工业生产迅速增长，仅1956—1960年，就增加了2.28倍，其中制造业增加了3.9倍，钢铁生产增加5倍，机械工业增加了14.5倍。1960年，日本政府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次年又制定了“农业基本法”和“促进自由化计划”，极大的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增长。1965年以后，日本又接受了美国侵越战争的40亿美元的“特需”订货，使日本对外贸易额急剧增加。从1965年开始出现顺差，到1972年达51.2亿美元，在1955年—1973年期间，日本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9.7%，1967年超过英、法两国，1968年赶上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居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1971年，日本出口贸易总额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三位。1972年，日本的黄金储备仅次于联邦德国居世界第二位。

第三阶段(1973年至今)是在危机的阴影笼罩下低速增长时期。在此期间，日本先后经历了1974—1975年、1980—1983年两次严重经济危机。从1974—1986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年均增长只有3.96%，其中1974—1975年是0.9%，1981—1983年是3%，1985年以来，由于日元升值，日本经济面临严重挑战，经济增长速度再次放缓。1986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只有3.5%，

外贸下降,失业上升,国内设备投资减少。尽管如此,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仍在继续上升。1976年,日本人均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居第16位,1984年上升为第10位,1985年上升为第7位,1985年底,日本的国外净资产达1300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1986年底突破了2000亿美元。1985年,日本年人均收入为17000美元,超过了美国。1984年,日本工业制品的出口就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九十年代以来,尽管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之中,但日本经济在各方面仍出现上升趋势,其发展速度仍居美国、西欧之首。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反映,也同日本国内的主、客观因素和国际和平环境以及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都有密切联系。

战后的日本同美国有着特殊的关系:军事上处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长期以来,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美、苏关系比较紧张,使得日本得以在军事上走“军事小国”的道路,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政治上日本处在大国的间隙之中,为自己争得一定的回旋余地。战后四十多年来,日本政局稳定,埋头经济建设。日本政府重视人才,高度重视国民教育,奉行教育立国政策。逐年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待遇和社会地位,施行了将义务教育从六年延长为九年的有远见的措施,在全民文化素质提高的基础上为国家培养大批建设人才和高水平的劳动力。这是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的两个前提条件。

战后日本实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铲除了一些不民主的制度,废除《治安维持法》和《国防保安法》,释放政治犯,断绝国家与神道的关系,扩大公民的基本人权和政治自由、平等权利,激发了日本国民的劳动热情。他们勤奋笃学,遵守纪律,出勤率高,积极提出合理化建议,不断以高效率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为国民经济现代化而奋斗。这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最重要的群众基础。

日本政府采取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明确宣布经济建设计划和目标，大力扶持企业集团，确定发展重点、产品种类，通过银行给予低息贷款，采取对企业有利的援助措施。围绕着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宗旨，施行“经济外交”、“能源外交”。在企业管理方面，非常重视调动人的积极性，建立一套有人情味的工资、奖励福利制度，在协调劳资关系中充分发挥了工会的作用。

日本重视技术和情报工作。日本是新技术输入最多和技术费用支出最高的国家。技术进步对日本经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从1982年到1986年的5年间，每年实际经济增长大约60%是由技术进步作出的贡献。另外，日本重视经济情报工作。政府与企业都有着庞大的国际信息机构，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首屈一指。某些机构，1分钟之内可获得世界各国各地金融市场行情，3分钟之内可查询日本与世界各地进出口贸易商品的品种、规格等资料。先进的情报网络，使日本的企业赢得了时间，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不放过一个有利的时机。

此外，战后四十多年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战后四十多年来，虽然地区性战争从未间断，但大规模的世界大战却未发生，使得日本在战后几十年中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其次是美国对日本的支持和援助。进入冷战时期后，美国为了把日本扶植为自己称霸全球的伙伴，曾给日本经济上大量的援助。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又向日本企业搞了大量的军用物资的特需定货。这些都促进帮助了日本企业的发展，扩大了商品出口。另外是五六十年第三世界廉价的原料和市场的强烈的需求为日本的复兴提供了条件。日本乘六十年代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之机，竭力提高自己在东南亚和中东的地位。另外，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支付的战争赔偿甚少，这也是日本经济得以迅速起飞的重要因素。当时，日本向印尼、菲律宾、缅甸和越南等国支付了总额约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赔偿的方式以“经济援助”